



• QINGCHUN DE ZHENGMING • 1986 •

青春的证明

陈旭东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我给祖国打电话.....(1)
- 青春的证明.....(3)
- 挑战与机会.....(17)
- 全方位跃动.....(57)
- 论观念之变革.....(84)
- 解放.....(119)
- 经济和人.....(158)
- 一个青年企业家的诞生.....(203)
- 好同志历险记.....(208)
- 一张光明牌.....(218)
- 牛场情话.....(228)
- 原始社会和未来世界.....(236)
- 通往生命健全之路.....(240)
- 生命的延伸.....(250)
- 生活向你提供信息.....(264)
- 含有多种维生素的思考.....(278)
- 永恒的乐园.....(289)
- 关于候补中年知识分子的报告.....(303)

我给祖国打电话

“喂，喂喂！”电话怎么老占线？可也是，眼看就是祖国的三十五岁生日了，大家都想和祖国说说话，都在给她打电话呢！

呵，电话通了。“祖国！是我呵！”

“呵，你好吗？”

“你好吗？”我说，“我是希望你好！你好我就好。”

“我好！小傻瓜！你到底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，我真幸福……”

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了。真是的！祖国现在不是经常平起平坐地和我们探讨各种问题，鼓励我们说话吗？“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。”有一次我说。“你要是说错了，我就轻轻拍一下你的脑门。”祖国笑着。“喂！”我大声答应着。我知道祖国那么爱我呢。

“你是个幸福的人。”——今春我家里来了四名从祖国的东、南、西、北来的记者，他们给我下了这么个结论。什么叫幸福？我在我的报告文学《挑战和机会》里写下了我的感受——一个被社会需要的人，就是一个幸福的人。

而社会，面临着不堪回首的十年遗留下来的问题、几十年“左”倾路线遗留下来的问题、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；同时又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，世界的挑战。祖国就象一个又要顾及老人又要顾及孩子的中年人似的，背负着不能推卸的、集于一身的义务、责任和使命。人愈是在重重压力下愈能磨砺意志，愈能焕发精神。当然，事情做得多了，话说得多了，缺点、弱点也表现得多了。就好比台上的演员总是比台下的观众毛病多。人可悲的不是有缺陷，而是没有机会把缺陷表现出来从而看清、改正自己的缺陷。一定的缺陷也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得以表现——生产关系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了，改革遇到重重阻力了，知识需要更新了，时间急待升值了……

我们从社会的问题中看到了人民素质的提高，我们从祖国的困难中看到了国家前进的脚印。我和我的祖国，和我们祖国的每一个人一样，都面临着不断发展的时代的挑战，和发挥才能的机会。我是兴奋的，但决不是轻松的。“祖国，”我终于对着话筒又说：“我来不及写呵，我怕跟不上呵！”“不怕。你看看有那么多人在写报告文学呢！”

呵，是的，一支报告文学创作队伍和祖国一起成长了。没有祖国这几年的变化，就变不出我们这些报告文学作者。社会需要报告文学，报告文学队伍就是一支幸福的队伍。

青春的证明

面对自己，面对世界——条件和机会——少一些戒备，多一些沟通——青春成长期大大缩短——任何时候都需要牺牲——时髦从年轻人开始——不以别人的好恶为办事标准——敢想就成功了一半

“你们京伦饭店的人平均年龄多大？”

“22岁。”

“不是说21岁吗？”

“现在是85年啦，我们长了一岁啦！”

我想起京伦饭店的外墙是等距离地一折一折的，好像是小孩儿用纸折叠出来似的。那么，这个拥有七百个客房的中外合营的饭店，果然是一帮小孩“鼓捣”出来的？

面对自己，面对世界

推开京伦饭店的玻璃门，只见大厅里整整一面墙、一面墙的镜子。八根镀铜的大圆柱象镜子一样反映着一切，又远比镜子闪亮、辉煌。镜子里有柱子，柱子里有镜子。镜子里有你，

柱子里也有你，你转来转去都会看到自己，都不能不正视自己。呵，对不起，请注意你的精神，你的仪表，你的服务，你的效益。

八根镀铜圆柱支撑着玻璃屋顶。玻璃和镜子把大厅向四周扩充出去，伸展开来。再看那一行标着温哥华、纽约、莫斯科、开罗、伦敦、北京、东京、卡拉奇、曼谷、墨尔本等地的时钟，使你感到一种空间感、一种时空的交叉，感到天地之浩大和精神之升华。天哪！有多少事等着你去探求、去学习、去开发！

站在京伦饭店的前厅里，使你面对世界，也面对自己。

条件和机会

前厅的主管是一位穿着黑西服，系着红领带的翩翩青年，名叫戴伟克。他正在接待外宾。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就象用气声唱的流行歌曲似的，轻松自如地从他的嘴里飘扬出来。

“你的英语不错呵！”我说。

“天天讲，惯了。”他刚和我说话，电话铃响了，显然是客房里的外宾打来要订小车上什么地方去的。

我听他娴熟地应答着。不无感慨地想起他曾经当了八年的飞行员。那时他一人自学英语。朋友们不免说他：“飞行员学英语有什么用？”有什么用？戴伟克自己也说不清。他只是觉得学了总会有用的。他买了本《英语900句》，读得可以从第一句一直背到第736句。当他背到第736句的时候，他复员了。复员是意料之中事。意料之外的是分到了京伦饭店，正好需要讲一口英语的人。他凭着他的“736”被分到前厅当主管。今天，他的英语水平已远远不止“736”了。他每天接触各种国籍的客

人，接待、派车、行李、预订……尽管外宾对他都讲的是英语。但只要他们一开口，他就能从各种语音中分辨出你是日本人，还是美国人，还是英国人，还是法国人……

戴伟克获得了一个好像是专门为他设置的岗位。我们有的人常常嗟叹自己没有机会。但是，先要创造条件，然后才有可能抓住机会。没有条件就无所谓机会。

少一些戒备，多一些沟通

我住在京伦的3047房间。我听见房门外的轻微的、似有若无的敲门声，随即是一声甜蜜的“May I come in?”（我可以进来吗？）

我打开门，眼前站着一个娃娃脸的十几岁的姑娘。“我现在可以打扫房间吗？”她眉眼间全是笑意。我邀她进屋聊会儿。她说她们服务员大概因为年龄小，所以特爱笑。有的时候外宾提的问题无法回答，也只好笑。外宾老爱问她们的工资。她不愿说，怕人家觉得我们的工资低，于是她就笑而不答。再问，再笑。外宾说，那么你一月有没有160元工资？她支吾着：差不多吧。可是，她哪有这么多钱呢？她又笑了。

北京的和外商合营的大饭店在客房部都不用女服务员，据说是怕出事。几十年来我们老是怕出事，尤其怕年轻人出事，结果是出了大事——极左，僵化，愚昧，自大。

“京伦”是合营饭店中第一家用女服务员的。“自己正，就不会出事。”她说：“而且干吗以为跟外宾在一起就会出事呢？外宾还讲究Ladies first(女士优先)呢。”

这位“娃娃脸”84年4月到“京伦”的时候，参加了两个

月的英语培训班，然后就是自学。有的时候外宾教她英语，她教外宾中文。“有几回外宾以为我懂英语，一讲一大堆我就听不懂了。”她笑了，坦诚而自重。人和人之间，本应少一些戒备，多一些沟通。

她叫周丽娟。

青年成长期大大缩短

“怎么样？客房怎么样？”客务部的中方经理傅天祝走进“3047”的时候，一边走一边就三句不离本行地问我。

傅天祝虽然才二十几岁，但毕竟是管着近300名服务员的经理。加之他穿一身黑西服，更是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庄重感。他开口闭口地称那些二十来岁的服务员为“小孩儿们”，这愈发地使他老成了几分。

“听说昨天你们部里又有一个要辞职的？”我急急地问。

“我们部里，开业以来主动提出辞职的已经是第二个了。另外还辞退了三名。别的部也有这种情况。”傅天祝不动声色地说。

可是，他们开业才100多天呵！

刚开业时，用傅天祝的话说——小孩儿们特热情。小孩儿们互相比着你穿什么制服我穿什么制服，他们觉得在这么漂亮的大饭店接待外宾，什么都新鲜有趣，做服务工作也有趣。“京伦”的西餐厅开业前，傅天祝和另一位经理去那里吃饭。两个人吃饭，五六个服务员争着把他俩当外宾服务。谁能抢到一点事干都高兴坏了。但是，很快地，摆刀、摆叉的都司空见惯了。而且现在社会上就业机会多了，集体企业奖金还高呢，做

买卖又很挣钱……再说，现在当服务员，难道十年、二十年以后还当服务员吗？

“其实，干什么都有个开始。”傅天祝说：“服务员当好了，以后可以当领班、当主管、当客务部经理……小孩儿们一方面思想很活跃，想得很多，一方面又很简单。昨天有个大孩儿托人交给我一份辞职书。上面写他今年23岁了，如果一年实习，一年出徒，就是25岁。他还当服务员年龄太大了！我不强留他。人得靠自觉自愿才能干好工作。”

傅天祝道出了一个当好领导的真谛——自觉自愿。“京伦”开业前，客务部的人要把客房所需的一切家具、用品从仓库拉出来，搬进电梯，搬入房内。近700间客房，每间房光是大家具就有10件。一个大柜子就得六个人才能搬得动。当时正值三伏天，又赶上暴雨、大水。可所有的东西必须按时搬入每一间房里，保证按时开业。

如何快速地、秩序井然地搬呢？当时傅天祝还不熟悉那些“小孩儿们”。不过，他正好可以通过搬家具来考察他们，培养他们。这样，将来一开业他就有了几个得力的主管了。对，你管指挥，你管清点，你管财务，你管……每个主管手下有几个领班。每个领班手下又有一帮小孩儿。这样，从傅天祝到五十八个领班，一层管一层。既没有损坏物品，也没有人受伤。虽然客房当时都没开空调，虽然有时大水没及腰际，虽然时间紧迫得小孩儿们一人扛起一个大弹簧床垫就走，虽然傅天祝自己也不过比小孩儿们大几岁，但是，自觉自愿是一种催生剂——能催生出人的思想、智慧、干劲和力量。

而自觉自愿的前提是被信任感和使命感。

傅天祝腰际系着的呼叫器响了。“京伦”的经理们每人都

有这个玩意儿。只要你不出饭店，别人就可以通过呼叫器找到你。

我明白他很快又要被叫走了。他们忙得经常回不了家，睡在“京伦”的地毯上，枕着一摞报纸。“客人的东西我们不用，否则洗衣房的人又得洗！”他说。但是周丽娟天天为了要给我换洗床单来找我。“我不用天天换洗的。真的不用！”我说。

“可是，我们规定了天天要给客人换洗床单的。”周丽娟带着她的永恒的微笑：“您昨天就不让洗，我真不好意思！真的，换一下吧。”

我从周丽娟身上看到了傅天祝的领导有方。“对不起，小孩儿找我有事，我得走了。”傅天祝象小孩似的不好意思地笑着。这一笑他“露出了馅儿”了——原来这位身着黑西服的经理自己也是“小孩儿们”中的一个。

少年老成。青年的成长期大大缩短了。但是，现在一些四五十岁的人还往往被称为年轻干部。那么，大量有才干的二十几岁的货真价实的青年，何时能作为年轻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呢？傅天祝是幸运儿，更多的青年是具有傅天祝的才干而没有傅天祝的机会。

任何时候都需要牺牲

“Coffee Shop”。

“京伦”的咖啡厅里，玻璃屋顶反映着绿色的地毯。身着绿装的女服务员在绿色的椅子间时隐时现，真如碧波仙子一般。这个静静的绿色的海洋，清爽、悦目。外宾一边用早餐，一边悠然地看《China Daily》，或是悄然地用笔划算着生意。

但是，在这个宁静的海洋底下，有一股绝非宁静的潜流。

咖啡厅的服务员是18岁到23岁的清一色的姑娘。这里需要微笑外交，但不能大笑，尤其是不高兴的时候也得面带笑容；这里需要活泼，可就是老得站着，尤其是干得愈多，就可能出错愈多。这位外宾要一份冰水，你正要去拿时，那位客人又要一份法式面包，于是你把那杯冰水忘了……

咖啡厅的上班时间是早5:30到夜里12点。因为外宾到咖啡厅吃快餐的人多，又要求快，所以咖啡厅40个姑娘分5个组轮流上班。保证早、中、晚客人多的时候有3个组的人在服务。这样，总有部分人一天要分两次上班。再加上倒班，加上轮到早5:30上班的总得住在“京伦”宿舍的双层床上，而不能住在充溢着母爱的家里，“碧波仙子”们身负重荷难免笑得不那么悦目，不那么动人了。

如果说“碧波仙子”们在咖啡厅好象跳着轻盈的群舞，那么，领舞的就是咖啡厅的经理——冯大锦。这个比众仙子们略大几岁的姑娘，高鼻、秀眼，端庄有余而活泼不足。“咖啡厅的经理应该是最活泼的，能够把整个厅的气氛都带得活跃起来的。”冯大锦端坐着对我说：“经理应该满厅走，和客人们打招呼。我呢，天生不爱和人接触，不会没话找话说。可是这里一顿早餐就是300外宾！客人也是一个人一个口味，有的客人嫌牛排不好吃了，我只好上厨房给他换个菜。因为我没吃过牛排，我也不知道牛排应该是什么味儿的。我一点不适合当咖啡厅的经理。我的眼睛甚至看不到客人——我老看着我们的服务员，唯恐有什么服务不到的地方。有些女孩子就烦我，在背后嘟嘟嘟地说我，当面不敢说。其实我真心疼她们。她们不少人腿都站肿了。有时我都没有劲头管了，看见谁靠墙干站着也不管了，

可是，我不管严些就要影响我们‘京伦’的服务声誉！”

据我所知，“京伦”上上下下公认最辛苦的部门就是冯大锦所在的咖啡厅，外宾表扬信最多的也是这个咖啡厅。“Coffee Shop”即将被评为京伦饭店的先进部门。

“评上先进？”冯大锦说：“这次评上，下次就不一定能评上了。我实在不适合干这个工作。”

明明不适合干某项工作而还能把这项工作搞好，这近乎是一种牺牲。

任何时候都需要牺牲。战争时期需要一些人年轻的就用自己的胸膛去抵挡敌人的枪口——没有领略过动人心魄的爱情，没有享受过丰富博大的人生。现在，当我们疾呼人尽其才的时候，也总需要有一些人为了学生的人尽其才当教师，为了作者的人尽其才当编辑，为了科技人员的人尽其才当后勤，为了“仙子们”各展其能而当咖啡厅的经理。

“京伦”把咖啡厅的责任压在冯大锦的肩上，冯大锦也就生长起足以承受这个责任的力量。女孩子们，记住，要微笑，但不能大笑！

时髦从年轻人开始

我找到了“碧波仙子”李小北，咖啡厅五个组里一位得力的组长。

自然很漂亮。事实上，一个22岁的人哪怕长得一般也会透着青春美的。年轻就是美。在咖啡厅用餐的外宾经常夸“仙子”们漂亮。“仙子”们也会用英语和他们开玩笑：你也很精神，你也很年轻——虽然对方每每是上了岁数的人了。

“客人有时工作得很紧张，我们又很累。说说话开开玩笑，客人和我们之间也可以互相调剂情绪。”李小北说话和冯大锦正相反——欢畅自如，充满了自信。

“在咖啡厅工作了一段，我看外国人经常吃一顿饭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月的工资，真不服气！中国人为什么就该穷？外国人能吃得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吃不得？以前我上街，饿了买俩包子，买个馅儿饼就得了。现在脏的饭馆我还不进去呢！我和女孩子们上饭馆，两人吃一顿，花个十来块钱吃几个菜，值了！我们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！年轻人敢吃苦，也敢享受。什么时候都从年轻人开始。”

以前我们常说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，这话对。但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指的只是生产，而不包括消费。现在应该再补上一句：外国人能享受的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能够享受——享受丰富的物质和无穷的知识，享受思想的活跃和创造的快乐。一个只会吃苦不会（不准？）享受的社会肯定是封闭的、狭隘的、守旧的、非现代化的乃至非人化的。

李小北比冯大锦小几岁，思想也“小几岁”——如果在思想观念上看不出年龄差别，那么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。愈是有活力的社会，年龄的差异就常常伴随着思想的差异。李小北的身上就时时显示着这种“小几岁”的差异：“冯大锦老想着以身作则，太辛苦了，我特心疼她。可是我觉得，她是经理就应该象个经理的样子！咖啡厅再忙她也不用端盘子。她指挥几个组长干就是。她还一点都不沾。可我觉得她应该在我们咖啡厅吃吃，才能知道各种菜的味道，才能知道什么牛排是好的，才能摸透各种客人的口味，才能主动！她不能老想着以身作则，经理应该与众不同。”

应该与众不同，这又是一种时髦，一种社会前进的积极因素。

时髦从年轻人开始。

不以别人的好恶为办事标准

“我觉得蚂蚁的智力被人过分高估了……它们的确很勤勉，堪称世界上最勤劳的动物。但我所指的是它们的冥顽不灵。”（马克·吐温《愚蠢的蚂蚁》）

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，否则将来就做不了第一流工作。”（李政道）

“我就是我。”（撒切尔夫人）

“留心避免和人争吵，可是万一争端已起，就应该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可以轻侮的。”（《汉姆雷特》中御前大臣波格涅斯的话）

.....

我翻看“京伦”的副总经理刘永生摘抄的文句，又好象看到刘永生其人——削得象男孩子似的短发，（她的名字、她的气质都象个男孩子）略微有些凹陷的眼睛，大约因为戴了眼镜的关系，更增加了凹度。端正的鼻子，薄薄的嘴唇。我第一次见到她就说：“一看你就很精干。”

“是不是太厉害了？”她边走边说。

“……”我笑而不答。因为厉害这个词是个贬义词，而她看上去的确是厉害有余，温柔不足。

她写自我鉴定的时候，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优缺点，缺点就是骄傲、急躁（但是，骄傲、急躁得具体分析，有的就不一定

是缺点)。

“你还能不能好好干？不干你就辞职！”她对一名职工说。这以后，这位职工一见她就甩门。“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”她喊住他，“有意见你就站出来提！”

怪不得小孩儿们(刘永生也是这么称呼职工)见了她就躲。

“有人说饭店等于一个家，小孩儿们不是怕爹就得怕妈，反正得有一个叫他们怕的。”刘永生淡淡一笑：“饭店正在打基础，不严一些也不行。不过，我的确也得改变自己的形象，不能老让人怕，我得对人亲热一点儿。”

想着要对人“亲热一点儿”的人，恐怕未必会对人亲热到哪儿去吧。我心里暗自好笑。

那么，刘永生的优点呢？

“我有什么优点我也不客气地写在自我鉴定上了。我就有一条——不以别人的好恶为办事标准。我不看眼色行事。”

有一次“京伦”和某单位说好进一批货。合同签了，钱也交了。这时一个很“有来头”的部门也向该单位要这批货，该单位就不把货给“京伦”了。

“没见过你们这样做生意的！”刘永生找上门去。

“你们小孩儿刚进社会懂不懂道理？做生意要看来头！”刘永生一下蹦起来：“你再说一遍，你刚才怎么说来着？”

“做生意要看来头。”

“我们年轻，听不懂。你再说一遍！”

“做生意要看来头！”

“看来头？好，我现在就告你们去！”

两天后，货如约运进了“京伦”。

“小刘呵，”人们每每劝这个不看来头的刘经理，“你不

知世态炎凉，不定哪天就摔在哪儿呵。”

“你觉得吗？”刘永生探问地望着我，“中国人正直的很多，可是敢说的不多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人都有光明的一面，黑暗的一面，我也是。可我就是容不得黑暗。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，所以不能团结人。我也知道我这样要求人是不现实的。我大概书看多了，生活在理想世界里了。”

“我不愿从别人那里批发思想。我读书，我剪报，就是为了活跃思想，为了寻找力量鼓励自己。书本是我最忠实的朋友。”她说。

敢想就成功了一半

“我没有经验，没有成绩，只是有一些想法。”刘永生诚心诚意地对我说。

不过，有没有想法正是一个人是不是有青春活力、是不是有才干、有进取心的标志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你要做一件事情，敢想就成功了一半。

刘永生的想法是跳跃式的。“小刘，你哪来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？”可不，她给“京伦”的各部门经理每人发一本阿瑟·黑利的长篇小说《大饭店》。“你们看看，这是一本经营饭店的很形象的教科书。”饭店开业前她又让各部门经理每天早晨和她一起站在大厅的夹道里，这是每一个“小孩儿”来上班的必经之地，她要求小孩儿们对每一个经理都得问一声“好”才能从夹道通过。这么坚持了21天，小孩儿全养成了见人就问好的习惯……

“为什么是21天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我从哪篇文章里看到过的，说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要21天。”

我见着刘永生那象学生似的认真的样子，真觉得她干什么都有她的理论依据，所以都能一干到底。“京伦”的大门口现在站着一个人，专门是向每个走进大厅的人问好的。这种专职问好的人，在北京各大饭店中似乎只此一个。

“一个现代化企业的领导不能事无巨细，事必躬亲。”刘永生讲话又是“理论先行”，“应该把重要的精力放在重要的工作上。我不能捆绑下面干部的手脚，我也不愿意让人、让事捆着。以前我们描绘好干部的形象往往是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，住小茅屋，啃大窝头，心里却想着全世界。有的单位的领导每个电话都自己接。一边接着电话，一边还和身边的人说着什么事，好象忙得要死。其实，这样陷在事务里必定影响效率。你看到我笔记本上记着的《不称职领导十五条》了吗？一个干部，要紧的是在其位谋其政。”

有一次一位外方经理对刘永生说，你们服务员的工资太少了。她说，你知道我拿多少吗？他听了说：啊——，那你为什么还工作？她说为国报效！后来“京伦”组织看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这位外方经理看电影的时候也哭了。他对刘永生说，现在他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努力工作了。

刘永生实在还充满了童心。1983年她在旅游局的乒乓球赛中拿了第二名。去年因为工作忙失去赛球机会。今年她还要参加乒乓球赛。“一说玩我就来劲儿。咯……”她笑着，眼睛闪亮着。

“听说你以前能拿大顶？”我问。

“现在还能拿！”